北京锡金会馆故事

| 刘桂秋 文 |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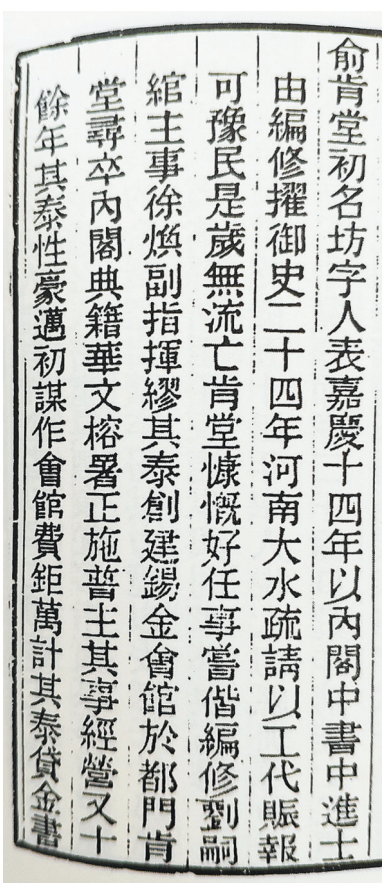
会馆，是指同一籍贯或同一行业的人，在京城及各大城市所设立的机构，建有专门的馆所，供同乡或同行活动、寓住之用。北京的会馆，兴起于明嘉靖年间，明万历时学者沈德符在他的《万历野获编》曾说：“京师五方所聚，其乡各有会馆，为初至居停，相沿甚便。”经过了很长的历史时期，北京的会馆越建越多，最盛时多达七百余家，其中就包括了在北京南城原“孙公园”中所建的锡金会馆（清雍正以后，无锡分置为无锡、金匮两县，故称“锡金”）。

锡金会馆的创建

孙公园在西城区和平门外琉璃厂以西，是清初孙承泽的宅园。孙承泽曾任清康熙朝吏部左侍郎；同时他又是一位学者，撰有《春明梦余录》和《天府广记》等著作。此园建于康熙年间，园域广阔，园内建有研山堂、晚红堂、兰韵堂、万卷楼等建筑。孙承泽去世后，宅园屡易其主。到了十八世纪初，孙公园逐渐圮废，园内屋地大都辟建会馆。先后在这里辟建的会馆有锡金会馆、台州会馆、泉郡会馆和安徽会馆等。

熟悉北京掌故的学者邓云乡先生曾在他的《旧时北京的会馆》一文中说：“会馆的房子，一般是在京地方人士和商号集资购置的产业。”锡金会馆的地产购置及建造，当也是属于这种情形。但很多年来，许多关于北京会馆的文献资料中，凡是提及锡金会馆的，都没有这方面的记载。笔者在撰写此文过程中，经反复搜检，在光绪《无锡金匮县志》卷二十“宦望”中发现了如下的记载：

“俞肯堂，初名坊，字人表。嘉庆十四年以内阁中书中进士，由编修擢御史。二十四年河南大水，疏请以工代赈，报可，豫民是岁无流亡。肯堂慷慨好任事，尝偕编修刘嗣绾、主事徐焕、副指挥缪其泰创建锡金会馆于都门。肯堂寻卒，内阁典籍华文裕、署正施普主其事，经营又十余年。其泰性豪迈，初谋作会馆，费钜万计，其泰贷金书券，而鸠助于邑之仕中外者，事以成。后官平阳通判。”


俞肯堂初名坊字人表嘉慶十四年以內閣中書中進士
由編修擢御史二十四年河南大水疏請以工代賑報
可豫民是歲無流亡肯堂慷慨好任事嘗偕編修劉嗣
綰主事徐煥副指揮繆其泰創建錫金會館於都門肯
堂尋卒內閣典籍華文裕署正施普主其事經營又十
餘年其泰性豪邁初謀作會館費鉅萬計其泰貸金書

由上述记载可知，锡金会馆是由清嘉庆时期担任过山东道御史的无锡人俞肯堂（初名坊，字人表，号东躔，1762—1819）偕同同邑人刘嗣绾、徐焕、缪其泰等人所创建；其中缪其泰因建造会馆所需甚巨，立票据贷取银两，谋求“邑之仕中外者”的帮助。俞肯堂辞世后，继有另外两位无锡籍“在京人士”华文裕和施普主其事，经营又十余年，锡金会馆才最终建成。据资料记载，锡金会馆位于北京西城区前孙公园（孙公园后来分成前孙公园和后孙公园）胡同11号，占地2.27亩，有房43.5间。另有附产，位于后孙公园胡同4号，占地0.33亩，有房11间。

唐文治与许珏的交谊

旧时会馆的一个经常性的作用，是为进京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提供临时住所。话说当年就有这样的两位士子，一个是后来成为外交官的无锡许珏（字静山，号复庵，1843—1916），一个是后来成为教育家、经学大家的太仓唐文治（字颖侯，号蔚芝，别号茹经，1865—1954）。两个人在一些年中，多次进京赴考，一住孙公园内的锡金会馆，一住宣武门外求志巷的太仓会馆。两个会馆相距甚近，两人因此时相过从，开始了一生深厚的交谊。

许珏和唐文治两人年龄相差22岁，却是在同一年（1882年）考中举人。两人又多次进京参加会试，据很多年后唐文治回忆，两人“一见深相契，遂为忘年交。每应京兆试，先生寓居前孙公园锡金会馆，余寓居求志巷太仓会馆，相距伊迩，时相过从”（唐文治《许复庵先生文集序》）。

许珏和唐文治的这种始于会馆的交谊，维持了两人的后半生，并且还延续到唐文治与许珏后代的身上。唐文治于1892年考中进士后，先是在清政府户部任事，许珏到京，每去唐文治处夜谈，两人“相与剪烛西窗，盱衡时局，辄慷慨言之，谓救国救民之事，舍我辈其谁任之”。1903年初，时任出使义国（意大利）大臣的许珏致书当时在外务部任事的唐文治，告知其由翟清松翻译、许珏修改并作序的《义国财政汇考》“大约两月后即可竣事，咨送尊署”“请中国有理财之责者，于无字句处体勘也”。同年9、10月间，已转任商部右丞的唐文治拟定了《商部章程》，许珏读后再次致信唐文治，称许《商部章程》“虑周藻密，已得要领……燕许大文，钦佩无既”，同时又向老朋友陈述自己的意见说“重商固属要图，而保商尤须实力”“尚祈审物产息耗之原，究国用盈亏之本，不徇流俗，轻易更张”。许珏辞世后，其三子许同莱编订父亲遗集，请唐文治作序，唐在序中称此集“琅琅巨制，如饬内治，慎外交，整理财政，严禁鸦片诸大端，举宜见诸设施，淑世而行远”。再到后来，许珏的孙子许寿平在唐文治任校长的无锡国专读书，唐对其颇为爱赏，并寄望其能勤勉好学，以竟祖父未竟之志：“文孙寿平，问业于余，茗发颖竖，崭然见头角。深冀其笃信好学，崇实敛华，庶几希圣希贤，有以成先生未竟之志。”

译书不辍逝于会馆的赵元益

在本文由锡金会馆连带而及的人物中，赵元益并非无锡籍，但他的出生和成长，都在无锡荡口；后来在上海江南制造局从事译述之事，也与无锡人有莫大关系；最后则是病逝于北京锡金会馆。

赵元益（字静涵，1840—1902），是江苏新阳信义镇（今昆山正仪）人，他的母亲华氏，出无锡荡口华家，华蘅芳、华世芳昆仲，则是他的表兄弟。1840年，华氏在回荡口归宁时生下了赵元益。元益八岁丧父，便又随母亲回荡口读书、生活。到了22岁，母亲患疟疾，为庸医所误而不治，元益乃肆力研究医学数年，并得精擅医术的外祖父华沛恩的亲授。1869年，在表兄华蘅芳的引荐下，赵元益进入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从事译校工作。

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发展历史中，“锡金四哲”华蘅芳、华世芳兄弟和徐寿、徐建寅父子是近代中国翻译家的杰出代表，是译介西方科技著作的先驱性人物。“四哲”之外，赵元益也是一个生力军。据有学者统计，赵元益在翻译馆期间，参与笔述、校对的译著有《海塘辑要》《冶金录》《临阵管见》《行军测绘》《儒门医学》《爆药纪要》《光学（附视学诸器图说）》《井矿工程》《数理学》《西药大成》《西药大成药品中西名目表》《内科理法》《保全生命论》《西药大成补编》等计二十多种，涉及数学、物理、化学、光学、军事、测绘、井矿、农学和医学等不同学科；其中的医学类著作，则被无锡籍“百科全书式”的学者丁福保（丁为赵元益的受业门生）评价为“输入泰西医学之一大关键”。

1890年初，近代无锡籍著名外交家薛福成奉命出使英国、法国、意大利、比利时四国，赵元益奉招加入使团，担任医官。期间，赵元益曾至德国柏林，向细菌学家、世界病原细菌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罗伯特·科赫学习治疗肺结核病之法。1894年回国后，赵元益仍回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书。1902年冬，因清末新政展开，京师急需有经验的翻译人才，赵元益力疾赴京，就住在锡金会馆。但到京后没多久，就因腹疾旧症复发，病逝于锡金会馆居易斋之东房。

始办于锡金会馆的东文学社

1901年3月20日（农历二月初一），近代北京第一家学习日语的教育机构——东文学社正式开馆了，学社的地点就在锡金会馆。

把学社的地点选在锡金会馆，与一个无锡人有关，这个人就是清代官员、文学家廉泉（字惠卿，号南湖，1868—1931）。而在廉泉的背后，东文学社的实际创办者，则是吴汝纶（廉泉夫人吴芝瑛是吴汝纶的侄女）。吴汝纶是桐城派后期代表作家，又是倾向维新的教育家。自1889年起，吴汝纶出任保定莲池书院山长，其间有一日本人中岛裁之曾受业其门下。吴汝纶在1899年时便拟筹办保定东文学堂，后因庚子事变爆发而愿望落空。不久之后，又在北京创办东文学社。廉泉在写给李鸿章和庆亲王奕劻的呈办东文学社的禀文中说：

“窃以时事日艰，惟振兴学林，作养人材为第一要义。今欲讲求西学，若概从西文入手，不独经费浩繁，且恐多需时日。查日本学校，于欧美政教、法律、文治、武备、格致、制造等学，一切有用之书，皆经译成东文。果能诣习东文，即取日本已译成之书，逐渐考求，自属事半功倍。职与慈善会总董刘铁云往返函商，拟先行借用南城锡金会馆，创立东文学社，招集京外汉文已通之士入学，专习日本文字。”

由这篇禀文可知，开办东文学社的目的，非仅只是学习日语和日本文化，同时也是借以学习“欧美政教、法律、文治、武备、格致、制造等学”，因为当时西方思想、文化、科学向东方的传输路径，常常是先传入日本，再由日本传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东方国家。

东文学社创办时，《老残游记》的作者刘鹗（字铁云）捐洋一千元，以为开学之用。学社由廉泉任总理处理内外事务，中岛裁之任总教习，负责所有教务工作。当时的办学条件非常简陋，黑板是用拆下的门板暂代的，椅子课桌是从国子监临时借用的；教材书籍，有借自中日人士的，有借自日本公使馆书库的。尽管如此，闻声前来报名就学者仍然十分踊跃，3月20日开馆时前来的人有60名，是定员的两倍；第二天增至90名，第三天是120名。到第五天的3月24日，因锡金会馆的教场实在容纳不下，便迁至北截儿胡同的江苏会馆中。尽管只有短短的四五天时间，但锡金会馆是东文学社名副其实的“始办之地”。